婚纱照的悲和喜

朱曾汶

我今年90岁了，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上海故事》节目摄制并播放了我和张芝的婚纱照故事，许多朋友看了都给我们打来电话表示欣慰，有一位朋友甚至用了“弘扬正气，激发骨气”这八个字，使我们颇有受宠若惊之感。

我和张芝是1950年6月8日结婚的，当时上海还保持着旧时结婚拍婚纱照的习俗。但由于时局关系，拍照的人很少，照相馆生意清淡，因此当我们去南京路国际照相馆拍照时，馆方把我们奉若上宾，不但给我们打了很大的折扣，而且为了做广告招徕顾客，还以更低的价格给我们加拍了许多张照片，把一个大橱窗陈列得满满的。其中一张新郎新娘及三个花童，我们一直悬挂在卧室墙上，一共挂了十六年。

1966年，“文革”爆发，破“四旧”风横扫祖国大地，美丽纯洁的婚纱照被当做最最丑恶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必欲置其死地而后快。处在风口浪尖上的张芝，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含着眼泪，把心爱的婚纱照从墙上取下，连同其他多张婚照，一张又一张地撕成碎片，在水里泡烂，再扔在抽水马桶里冲掉。当时我们的心情用“难过”二字来形容是远远不够的。对于天性爱美，把婚纱照视若人生至宝的张芝来说，更是最大的残酷和耻辱。非但如此，以婚纱照为罪名之一，我们还遭受了更大的人身迫害，经历了九死一生的危难。

改革开放，春回大地，婚纱照已恢复她的本来面目，进入千家万户。今天青年人结婚，哪个不拍婚纱照？就连农村，婚纱照也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我们夫妇在庆幸我们能活到这个太平盛世的同时，也为我们失去了最爱的婚纱照深深惋惜。我们也曾寄希望于哪一位至亲好友或许还奇迹般保存着一张我们当年送的婚纱照，但奇迹终究是奇迹，它绝不会轻易变成现实，我们的多次探询都落了空，每次都以失败告终。

皇天不负有心人。1990年，正当我们已死了心，不再对找回婚纱照抱有奢望时，忽然收到表妹从台湾寄来的一封挂号信，拆开一看，里面赫然是那张我们已失去24年，朝思暮想、求之不得的婚纱照。原来这张4吋的小照片是我们当年送给在香港的七姑母的，七姑母1990年去世后，表妹去香港奔丧，从姑母遗物中捡出这张照片，她凭直觉猜想这张照片我们可能不会有了，就把它寄还我们。时隔40年，历经两岸三地，这张照片重又回到我们手里，我们的喜悦和兴奋是可想而知的，我想买彩票中头奖也不过如此。只可惜因为年代久远，照片已严重霉变，女花童的一只手臂全没了，幸亏所有人的脸部都保持完好。张芝把照片拿到南京路一家著名照相馆去修复，索价500元，当时她的月薪才百来元，只得作罢。在这个节骨眼上，又是台湾的表弟帮了大忙，他自告奋勇把照片带回台湾，请当地最好的技师把它修复后送回。当我们看到这张已经放成24英寸，焕然一新的照片时，喜欢得跳起来，仿佛又回到了甜蜜的新婚年代，曾经有过的忧愁和烦恼，一下子全都烟消云散了。我们把照片配好镜框，重新挂在卧室墙上，它将永远陪伴我们，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行文至此，惊喜地看到了小友杨重振和吕向晨双双从加拿大飞回上海结婚拍的婚纱照，厚厚两大册，千姿百态，五彩缤纷。婚纱照在不长的时间里飞速发展到这个地步，实在令人惊叹。相比之下，我们这张60多年前的黑白婚纱照显得何其单调寒碜！但是从另一种意义说，它见证了时代的更迭变迁，经历了人生的大悲大喜，它对于我们这对老年夫妇是特殊的、唯一的，具有无可比拟的价值。

而对于局外人特别是青年人，或许也会使他们受到一点启发，悟到他们如今的生活来之不易，必须千倍重视，万般珍惜。

与朱虹先生的一段书缘

徐鲁

闲暇时，我喜欢逛一逛旧书铺和旧书摊。倒不一定是像一些旧书收藏者那样，怀着明确的猎书、淘书的目的，有时纯粹只为感受一种故纸芬芳，享受一下翻阅旧书的好奇和乐趣。也因此，在我的心目中，旧书商，是一个十分美好和温暖的词，总让我想到那些令人尊敬、让人怀念的卖书人和藏书人，想到电影《查令十字街84号》里那家旧书店，那位善良的旧书商和他远在美国的读者之间的浪漫、温暖的故事。

我在二十多年前，买到过一本“三联版”旧书，英美文学专家、翻译家朱虹先生的《英美文学散论》。这本小开本的素雅小书，系三联书店“读书文丛”的一种，我很喜欢。全书虽然篇幅不大，却是朱虹研究英美文学的一本极具分量的学术文集，文风也十分隽永清丽。书中还留下了美学家朱光潜先生的一篇珍贵难得的序言。

在这本旧书里面，还夹着一张读书卡片，上面用秀丽的钢笔字写着一首短诗《真正的体贴不声不响》：“真正的体贴不声不响，它不会与任何感情混同。你不必小心翼翼地用皮衣，裹住我的肩头与前胸。你也不必倾诉，初恋时的衷情。我是那么熟悉，你那顽固的、贪婪的眼睛。”这娟秀的字体和隽永的诗句让我不禁想象和猜度着：写下这首小诗的人，或许就是这本《英美文学散论》原来的主人，那个写在扉页上的名叫“胡怡”的人？也许是个女孩？那么，这首诗是她自己的创作，还是从哪里抄来的？她是要把它写给谁呢？她是正处在热恋之中，还是已经尝到了失恋的滋味？她所“熟悉”的那双“顽固的、贪婪的眼睛”，给她带来的是痛苦还是欢乐？我还想到，能够购买和阅读《英美文学散论》的人，大致应是具有相当文学品位，并且是一个爱书的人吧？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这本书离开了他或她，而流落到旧书店里来了呢？

过了五六年之后的某一天，和一些电视界的朋友一起吃饭，席间有一位女士，是电视节目的编导，芳名就叫“胡怡”。这使我顿时想到了写在《英美文学散论》扉页上的那个名字。我试探着把话题引向了阅读，顺便问了她一句：你大学时代喜欢读些什么书？答曰：外国文学。“我也喜欢外国文学。”我心中窃喜，又说道，“我读过一本三联版的、白色封面的《英美文学散论》，我很喜欢。”胡怡想了想，说：“我也读过这本书，我自己还买过这本书，是翻译家朱虹的著作……”这时候，我心中有数了。这真是一个“小世界”啊！而因为一本书带来的缘分，我很珍惜。

不久，我约了胡怡喝咖啡，带去了那本旧版的《英美文学散论》，让她重睹了自己的签名，还有夹在书中的那张写有诗句的小卡片。记得当时，胡怡十分惊讶，翻动着书本，看着小卡片，眼睛一下子就湿润了。她也许是想到了“初恋时的衷情”。我想把这本小书送还给胡怡，但是她说：“这本书现在已经属于你了，也许你留着更有意义。如果你愿意，你把这张小卡片给我留个纪念吧。”就这样，这本旧书仍然留在我这里，小卡片则物归原主了。

又过了十多年后，2012年深秋时节，我有幸参加了在东湖边召开的海外华文女作家年会。在会议上，我意外地见到了心仪已久的女翻译家和学者朱虹先生。第二天，我特意带上那本保存完好的旧书《英美文学散论》，请先生题词留念。朱先生是虚怀若谷的大家闺秀，分别用中文和英文题写了两句温润和客气的纪念语。如今，这本素面而雅致的小书，成了我书房里的一册珍贵的题签本。

玫瑰花与雪茄

田永昌

转眼，儿子田英人在美国四年的高中生活结束了。5月19日，他所在的圣玛丽男子高中举行隆重的毕业典礼，诚邀所有学生家长出席。于是，我与妻飞赴美国，亲历了美国高中毕业典礼上那隆重、欢快而又非常感人的一幕。

毕业典礼这天，整个圣玛丽校园成了欢乐的海洋。仪式是当地时间上午十点开始，当我们九点多钟赶到时，校园里已是到处人影晃动了，男士们女士们都身穿正装，连小孩子也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他们是从世界各地赶来的。有个韩国学生的家中一下子来了二十多人。有意思的是，除了学生家长外，连附近的居民也参加了进来。让人感觉这既是学校的毕业典礼，也是当地的一个盛大节日，可见美国人对教育的重视。

整个毕业典礼历时一天，分五个部分进行。因为圣玛丽高中属于教会性质，首先便在圣玛丽大教堂做弥撒，然后，全体毕业生两人一组上台接受神父的赐福，当欢乐颂的乐曲奏起时，所有学子从神父手中接过鲜艳的红玫瑰，纷纷下台献给自己的家长，并热烈拥抱，以感谢他们的养育和培育之恩。玫瑰花香四溢，热情的拥抱祝福，这样的情景催人泪下。散场后的第二项活动便是在大教堂前，学生与老师和家长们自由交谈和拍照。午餐也是校方精心安排的很有特点的节目，每张餐桌上都摆着用有机玻璃相框镶着的学生照片和毕业纪念杯。学生和家长按照照片找到自己的餐桌，边吃边交谈，别有一番情调。颁发毕业证书的典礼安排在圣玛丽体育馆举行，上千人的馆内座无虚席。当身穿黑色毕业礼袍，头戴黑色毕业礼帽的学生们列队进场时，全场起立，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和欢呼声。当校长高声宣读全部毕业生名单和毕业生代表致感谢词后，学生们便依次上台从校长手中接受毕业证书。不管哪个学生上台，全场皆是报以热烈掌声。此时此刻，此起彼伏的掌声和欢呼声，让身处此境的我们不由心情异常激动。

毕业典礼的最后一个节目便是雪茄聚会，所有的人聚在教学楼前绿树下的草坪上，以吸雪茄的方式来结束全天的毕业盛典。这种场面也是我们从未见过的。此刻，不管校长、老师、学生还是家长，嘴上全部含起了点燃的雪茄烟，一时间，空气中飘散起浓浓的雪茄烟味儿，大家边品味雪茄烟边交谈合影，儿子当然也是嘴上含着雪茄，我们还是第一次见他抽雪茄呢！我有些纳闷了，学校的纪律是不准学生抽烟的呀，儿子有个中国同学就是因偷偷抽烟被校方发现后开除了。现在，学校却又是以这样的方式来结束隆重的毕业盛典。我不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我的感慨，此刻，身处无拘无束的雪茄聚会场面，让人真的浮想联翩，东西方文化和教育的差异从中也可见一斑了。

玫瑰花、掌声、欢呼声以及飘散的雪茄烟味，学校以这样的方式来欢送学生们走出高中校园，这样独特的毕业典礼让学生和家长们永远难忘。

地质奇观野柳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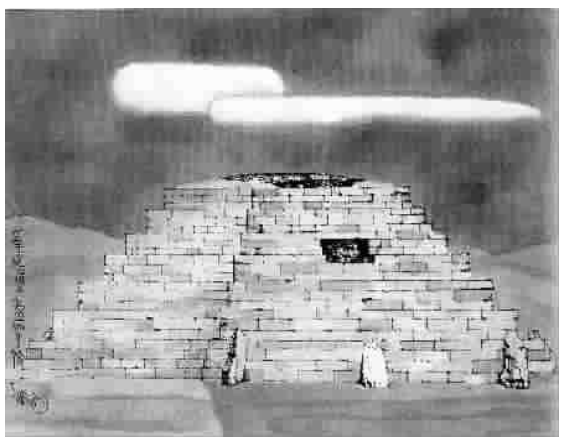
缪俊杰

野柳，在台北基隆市西北15公里处。汽车在台基高速公路上行驶一个多小时，离高速北行，便来到台湾北部一个细长的岬角。这就是野柳。远远望去，这个叫“野柳”的地方就像一只蹒跚前行准备离开海岸的海龟，所以这里叫“野柳龟”。

野柳龟，它确确实实像是漂浮在海上的巨龟。据导游介绍，这个貌似巨龟的岬角，长1600米，宽约200米。有趣的是，这“野柳龟”时隐时现。海水涨潮时，海浪会掩没野柳长长的通道，“野柳龟”的头会伸出海面，变成一个隔离陆地的“离岛”。海水是活动的，“野柳龟”是固定的。海水与它处于同一水平面时，海浪翻滚，巨龟就会在水波之上时沉时浮，从而形成活的海龟的奇观。

野柳龟的风景是由众多的奇石组成的。我们一进入野柳，一个被称为“女王头”的巨石映入眼帘。这是一个“蕈状巨石”，造型犹如“女王”，头上戴着缀满宝石的皇冠，似有“君临天下”之气派，因而美其名曰“女王头”。这位女王修长的颈项和蓬松的发髻，从来都不会萎落或低垂，似有傲然屹立之“王气”。只是在远处可以看见她身体的另一部分，似在哺育众生。除了“女王头”，人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许许多多“蕈状岩”，有的似烛称为“烛石台”；有的似蜂窝叫“蜂窝岩”……在落日的余晖或月色朦胧的光照下，这些石头仿佛就有了生命，就会“复活”，变成众神的化身。人们从这些怪石、巨石之中，感到天和地，人和神，现实和虚妄，相互交织在一起，让人产生梦幻般的感觉。

野柳目前已成为开放的旅游胜地。我来到野柳的那天下午，下着蒙蒙细雨。一下车便有一两个台北妇女走近前来，很亲切地说：“先生，买把雨伞吧！”当她看到我们已经张开自带的雨伞时，就搭讪起来：“你们是从大陆来的吧！”我们说：“是的，从北京来的。”这妇女嫣然一笑，说：“听说北京人很有钱，在世界上地位提升了。”我答：“我们都是工薪人员，生活比以前好多了。”她点点头，露出了羡慕的目光。我也会心地一笑。是啊，祖国内地人的地位在台湾人的心目中，已经大大提高了。以前台湾人来内地探亲，内地的亲友特别是农村里，都向台湾人要钱要物，如今内地人生活水平提高了，在台湾人看来，内地人已经有钱了。我不由得从内心骄傲起来。内地经济发展了，地位也提高了，人们的自信心自然也就提高了。



高句丽王陵（中国画） 丁筱芳

八十岁的童心

宋捷文

儿童剧场真奇妙，可以使人返老还童。回想1958年上海第一个儿童剧场诞生，开幕典礼演《枪》。孩子们看完演出在剧场里雀跃、欢呼，演员们一次又一次地给孩子们谢幕，每个人都热泪盈眶。当时的我就在台上扮演一位革命老区的区长，而与我演对手戏的儿童团员的演员们都是剧院十八九岁的美女靓仔。

二十年后再见到这帮伙伴们，我早已从台前转到幕后写剧本了，可她们中不少人还在台上演少先队员、大灰狼、小白兔什么的。看她们一举手一投足，活脱是个天真烂漫的孩子和神气活现的动物。比当年演得更真实、更生活，更像孩子了，哪像是一群四十多岁的妈妈呀！而在剧中曾被我揪鼻子的儿童团长，直到去年，七十多岁了，见到我，忽地把鼻子一捂，那股顽皮逗趣的神情，一瞬间使我感到时光倒回了五十年。当时我就想，如果现在需要他上台，他照样能演儿童团长。

说到转行写儿童剧，我是上海人讲的“野路子”。没有受过编剧专业教导，底子薄，就凭着在儿童戏剧舞台上演过几年戏，对小观众有那么一点了解，仅此而已。虽然没有写过什么出色的好戏，可对我来说，却是每写一出戏都有不同的收获，几十年日积月累，竟然不知老之将至。因为我采取的手段，还是演员的路子，就是每写一出戏，自己就把主要人物的台词、身段统统试演一番，重要的情节都在心里过一遍。有时候很顺利，有时候十天八天也过不去。譬如“时间老人”要怎样才能倏忽变化；“课桌椅”怎样痛苦才特别有趣；“中学生”的孤独感和在绝望中听到同伴歌声的心态；“美人鱼”失去声音以后的情境安排等等，都要求我学会用儿童的眼睛看，用儿童的耳朵听，用不同年龄的儿童心理来体验和审视我笔下不同的人物。感谢儿童剧院，允许我这样一出一出写下去，不知不觉使我有了一颗挥之不去的童心。直到八十岁还想着为孩子写戏，还能喃喃自语，手舞足蹈地演绎一个小学生陡然变成老师的心境和体态。试想，一个白胡子老头儿能忘我地进入儿童世界，岂不是返老还童了么?!

戏剧大师黄佐临先生，有一次来看《巴塞罗缪卡宾斯的500顶帽子》。他老人家不仅在剧场里兴致很高，回去以后，半夜里还会打电话来询问，那么多帽子是怎么在那小孩子头上长出来的？听到这么天真的问题，使我惊叹不已。戏剧大师一转身变成好奇的孩子了！你说儿童剧场奇妙不奇妙？

十日谈 我的青春年华都是在剧场度过的。

我与儿童剧场

满江红 闻故宫禁烟有感

陈以鸿

何物香烟，喷毒雾争堪向迩。吞吐处，熏肤伤肺，玷唇污齿。几度权尝成痼习，一朝上瘾称“君子”。多少年肆虐泱人群，千夫指。

虽有禁，曾未止。虽有令，如废纸。问甚时还我新鲜空气。请以故宫为式范，从教百业趋方轨。愿将来寰宇庆澄清，齐欢喜。

夜光杯